

宋代的处士内涵与处士文化

吕肖奂

[摘要] 处士常被美化为隐士,处士文化也因而被简单化归结为隐逸文化。而实际上,处士真正的社会身份一般是山林乡野中有文化的富民、城镇市井中的医卜及文化技艺人。这些被有意无意淡化了真实社会身份的处士们所生产创造出的文化,其实是涵盖了隐逸文化而更具农工商民间色彩、更具社会底层色彩且并不单一的文化。宋代的处士文化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乡绅文化以及城镇工商文化。但在处士与士大夫的合力作用下,宋代的处士文化特别是处士文学,其乡土市井气息被全然隐藏或遮蔽。

[关键词] 宋代处士;农渔医卜;乡土市井;处士文化底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12—0178—06

基金项目: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11BZW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女,河南灵宝人,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面:宋元文学。四川 成都 610014

几乎所有不仕的各阶层、各行业文化人,在宋代都可以广义地称作处士,这从现存的大量宋代处士墓志铭、墓表等文献中可以得知。处士在当时其实就是非官方文化人的代称,处士文化也就成为民间文化的代称,成为与官方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处士文化虽然有些分散和隐蔽,但从理论上讲,其规模与态势应该超过官方文化,或至少与之抗衡,这是因为处士数量绝对多于官员。

宋人经常将处士与士大夫相提并论,如“公之亡,士大夫相吊于朝,处士相吊于家,皆曰德人往矣”^[1](P.709),均以二者指代在朝、在野的所有士人,代表整个士人阶层,由此得知,宋人把处士看作是能与士大夫同日而语的在野力量。而今人很有必要回顾和还原处士以及处士文化的本来面目。

一、诗文中过于超凡脱俗的处士形象

从多数宋人对处士的描述中,很难看出处士从事的哪类具体工作,如王禹偁《批答处士陈抟乞还旧山表》云:“卿不事王公,多历年岁,雅有神仙之态,蔚为高尚之人。”^[2](P.6) 这位陈抟高卧华山,远离红尘,吸风饮露,完全是个神仙般的处士。徐铉《答左偃处士书》“足下负磊落之气,畜清丽之才,褐衣韦带,赋诗自释,介然之操,其殆庶乎?”^[3](P.9) 这位左偃处士似乎以赋诗为职业,是个诗人

型处士。

诗歌更是将处士描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全然是超然世外的高人神仙:

潘阆《赠林处士逋》:云翦乌纱雾翦衣,存神养气语还稀。人人尽唤孙思邈,只恐身轻白日飞。^[4](P.571)

寇准《赠魏野处士》:人间名利走尘埃,惟子高闲晦盛才。欹枕夜风喧薜荔,闭门春雨长莓苔。诗题远岫经年得,僧恋幽轩继日来。却恐明君征隐逸,溪云谁得共徘徊。^[5](P.37)

谢逸《寄隐居士》:处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6](P.352)

章宪《题处士顾禧漫庄》:何许明人眼,松间见古堂。泉声到槩几,山影覆绳床。爱酒陶元亮,听蛙孔德璋。纷纷战蛮触,丘壑信难忘。^[7](P.1051)

吕本中《抚州俞隐居挽诗》:临川俞处士,独擅隐居名。懒倦不复出,风流闻后生。^[8](P.827)

这些处士不论居处何地,但都深幽清静,远离世俗,无从得知其生活资本来源,整日优雅风流若神仙,根本不用从事任何劳动,而且无任何繁杂尘务。

处士因此有很多别称,如隐士、隐者、山人、居士^①、高人、高士、散人、野人、樵子、渔夫等等,还有逃名客、沧洲逸之类的美称。这些称呼也都表明,

处士一般都生活在世外桃源或是远离人境的乐土净土,他们属于哪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以何为生,都不能够也不需要说明。

事实上,当人们透过文学表述而探究处士的实际生活,就会发现处士并不那么超凡脱俗,就会发现飘逸出尘只不过是人们构建的处士幻象。

二、并不完全清寒贫苦的山林村野处士及乡土文化

孙覿《宋故府君陈公景东墓志》云:“余闻古之处士,或隐于山,或隐于市。隐于山者寓耕钓,而隐于市者寓医卜。”^{[9](P. 428)}就将处士按照隐居空间分为乡村与城市两种,且指出二者因为居处差异,其谋生的手段与所掌握的生活技能也不同。前一种是山林村野中农夫、渔夫式处士,后一种是城镇市井中医生、术士等技能类处士。

农夫、渔夫遍布山林村野,却并非人人都可以算作处士。那么处士与普通农夫渔夫的区别在哪里?“耕钓”是农夫渔夫赖以生存的职业,但对于处士而言,“耕钓”却只是他们寄“寓”世间、偶或为之的隐逸方式而已。处士有不同于普通农夫渔夫的超然世外的精神追求,尤为关键的是,他们有实现这个精神理想的经济基础。

处士被美称为隐士高人后,总予人以特别高洁清寒的印象,使得人们很难将其与“富人家”、“富民”、“豪富士族”联系起来。而实际上,没有丰厚家产的农夫渔夫,根本没有成为隐士高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因为为生存而必要的繁重劳动,会使他们丧失读书学习以及追求精神生活的时间和精力。而处士之所以能够不求仕进、不慕荣利,还能够进行慈善活动、文化活动,大多数是因为其承袭了祖辈留下来的丰厚家产,不必为生计而劳累奔波。如苏颂《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云其“藉父产栖遁,不求仕进,乡里号处士”^{[10](P. 595)};欧阳修《连处士墓表》云“处士少举《毛诗》,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废于家,处士供养左右十余年,因不复仕进。父卒,家故多货,悉散以啖乡里”^{[11](P. 674)}。两个处士都有丰厚的“父产”、家产作为栖遁的经济后盾,即便不入仕途也不必像农夫渔夫一样辛勤劳作,而有余裕从事文化活动。

有些处士则是因为其兄弟入仕,家庭富足,不需要为生计问题操劳,乐于隐居逍遥。如杨亿《史馆阮比部知衢州因归建阳别墅二首》自注云:“比部兄昭济,隐居不仕。”^{[12](P. 206)}其兄不仕,自然是因为其弟做官而有经济来源。王禹偁《送宋灏处

士之长安(内翰舍人弟)》云:“簪笏盈门独纫兰,卧龙潜在八龙闲。鸰原任说朝贤贵,鹤运惟称处士闲。静按仙经烧大药,狂挨僧壁画遥山。老郎见作归休计,分取圭峰并掩关。”^{[13](P. 14)}宋灏处士之所以能过着烧炼丹药、作画寺壁的逍遥生活,正得力于“簪笏盈门”的经济后盾,尤其是其弟为显贵的“内翰舍人”,不仅从经济上对其兄予以支持,而且还为其提供了联络官员诗人的平台。

有些处士极其富裕的财产来源不明,如苏舜钦《处士崔君墓志》所云之崔遵用,两次殿试落第后,“遂行买田筑室于箕、颖间”^{[14](P. 374)},过起隐士般生活。能够在近于京畿之地“买田筑室”,绝非贫寒之辈可为,很难查证其财产来源。

这些经济条件优越的人,不必为生计而操劳打拼,因而才能将普通农夫渔夫艰苦艰辛之“耕钓”变作休闲享受,才可以成为远离凡尘的理想型处士。当然,贫富是相对而言的,况且贫富也并非考核处士的必要条件,但潇洒出尘的处士多数需要足够其潇洒的经济条件。

宋代多数处士并非一无所有或一味清贫寒苦,而是一如明清人所说的“乡绅”以及今人所说的地方精英^②。富足而有文化的山林村野处士,往往不满足于“耕钓”,他们还通过“聚学”等方式以区别于普通农夫渔夫。王禹偁《乞赐终南山人种放孝赠表》云:“伏见终南山处士种放,山林素养,孝友修身,既聚学以诲人,亦躬耕而事母。”^{[15](P. 7)}“躬耕”之外还能“聚学”,才是不同于农夫渔夫的处士行为。有些处士不仅仅只是小规模“聚学”,他们还会开书院或学馆,如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就谈到当时不少处士开书院的情况:“学馆之南有雷塘焉,因以为名,且志其地。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者鼎峙于江东矣。”^{[16](P. 245)}仅江东就有三家处士开办的书院。可知当时一些处士的经济实力以及办学能力,他们还能找到当时的文坛盟主为其书院做广告,其商业宣传意识十分超前。这些民办教育家型处士,完全是务实能干的实业家形象,颠覆了飘逸出尘的隐士形象。他们创造的文化,已经无法用隐逸文化来简单概括。

三、城镇市井中文化技艺型处士及医卜星相文化

孙覿所说的后一种处士即“隐于市者寓医

卜”。古代“医卜”地位低贱,而处士却是令人尊敬的名号,普通的“医卜”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处士呢?

宋代士大夫对四民中的工商有着理解之同情。如郑刚中《相说》云:“今之所谓四民者,士则有学,农则有畎亩,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为工、商者,必有所挟,工挟艺,商挟货,犹舟之维楫、鸟之羽翼,无须臾可舍,故有所挟则得,无所挟则困矣。”^{[17](P.79)}就指出工商因为没有士农那样赖以生存的学问和田地,所以才“游散四方”,其生存条件比士农更为艰辛,工商更需要掌握过硬的技能与本领才能生存发展,因而不当受到歧视。

郑刚中在该文中指出相术就是“工”之技能之一。多数宋代士大夫与郑刚中一样,认为掌握“医卜”之类技能的人属于“挟艺”之“工”,不属于“士”阶层,虽说不应该被社会歧视,但总是被传统观念认为低士农一等。

而因为士大夫常常享受这类“工”人的服务,所以尽管地位悬殊,士大夫也不全然鄙视这类“工”人,反而经常在诗文中称赏这类“工”人中的优秀者。如曾巩《徐复传》云其“博学,于书无所不读,尤通星历、五行、术数之说,世罕有能及者”^{[18](P.1)};周紫芝《书枯冷道人李处士序后》云“今龙溪李君,独能略去近时诸家地理书,时时自出新意,颇有奇中,可谓不传之妙也已”;《赠欧阳可夫序》云“欧阳处士可夫以‘听声法’观人,百不失一二”;《赠罗一新序》云“丹丘罗君一新,以星度之学推人寿命亨穷,若指诸掌”^③。文中所云的这些擅长星相、术数、堪舆等文化技艺的工人,极受当时士大夫以及其他阶层人的欢迎,其中博学识高、技艺超群者常被士大夫们称作处士。由“工”上升到“士”,是士大夫对优秀“医卜”们的极高褒奖。

医卜之外,擅长绘画一类的民间艺术类人才也被称作处士,如杨万里《赠写真水鉴处士王温叔》以及楼钥《叶处士写照》、《叶处士画貂蝉喜神见惠》所说的就是画人物的处士,这类写真、写照的人物画处士在南宋尤多。画花鸟的处士也复不少,如陈造《题胡处士猿麝图》所说的胡处士,赵蕃《从徐处士乞梅二首》“江南处士杨无咎,畴昔最工梅写真。闻道徐郎得其妙,何妨乞我一枝春”^{[19](P.293)}所说的杨补之十分著名。擅长绘画的处士也颇受士大夫欣赏。

此外还有制作文房物事的技术工人,也被称

作处士,晁说之《赠笔处士屠希》云:“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却屠秋兔毫。”^{[20](P.172)}屠希应是位手艺人兼文化用品商人。又如陈造《题笔工俞生所藏书法》云:“俞处士造笔精致甲吴中。俞颇能书,理则然。然糊口之余,见古碑、法书,捐衣食求之不论价,此亦奇嗜癖好,未可以常情计。所蓄多善本,此轴真迹可宝。士大夫愿得之者,俞能有之,予敢以市工例视之耶?”^{[21](P.682)}这位“市工”,不仅能制作工艺精良的毛笔,而且在本职之余,擅长书法还收藏古碑法帖,实在是士大夫不敢小觑的处士。这些处士,让人们了解到工商阶层生存技艺之外的文化水准。

具有文化才能技艺嗜好的“工”人都可以称作处士,处士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几乎成为画工、技工、医工、相士的别称。

实际上,不只是“隐于市者寓医卜”,许多“隐于山”的处士,也常靠医卜类技艺而获取更大声名。宋初陈抟即是如此,而种放也并非如王禹偁所说的仅仅是耕读养亲,他还有很多才艺,孙仅《赠种征君放》即云其“诗篇落处风雷动,笔力停时造化闲。仙术每将丹诀解,史才曾把逸书删”。有能解丹诀的仙术,才是朝廷一再征召种放的原因之一。在普遍相信天命的时代,从朝廷、士大夫到农工商市井小民都需要这样的才能以指点迷津。欧阳修曾上书“论妖人、方术士不宜出入禁中,请追所赐‘先生’、‘处士’号”^{[22](P.163-164)},可知当时朝廷为许多“妖人、方术士”赐予过处士的名号,由此能够想见当时医卜类处士的兴盛程度。

不少处士对医卜星相一类的知识有着天然的兴趣,十分热衷钻研这类知识技艺文化。苏舜钦《处士崔君墓志》所云之崔遵用,在“买田筑室于箕、颍间”之后,就过着“穷堪舆图纬、风角推步、佛氏道家书,以至笔墨图画、方药种艺之事,毕精焉。间引农樵共饮,醉辄酣歌起舞以自快,绝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为。乡人以‘处士’名之”^{[14](P.374)}这样的生活。民间文化人在抛开科考规定、官方要求后,大都会在星相医卜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找到谋生的技能乃至人生的乐趣。因此,医卜星相等文化技艺就成为宋代处士文化的又一基本底色,成为处士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区分点。这个群体或阶层,从数量规模上讲壮大无比,他们创造的文化自然也繁荣昌盛。

四、处士与游士之异同

从处士的生活空间与谋生方式看,宋代处士

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城乡农工商文化技艺人的特殊阶层的人。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只有居住在山野乡村的文化人才多数被称作处士,而城镇中的文化技艺人少数被称作处士,多数则被称作游士。

宋人如何区分处士与游士呢?游士大体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求学的游士,一种是谋生的游士。求学的游士靠诗文,其目的是为了参加科考而入仕,多数是短期的;谋生的游士大都靠的是星相医卜、书画技艺在城镇中生存,多数是长期的。经年累月不能及第的游学之士,也会转化为谋生的游士,所以二者也不能完全区分开来。两宋都有游士,而到了南宋中后期,游士才从处士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阶层^④。

城镇里的处士与游士,仅从谋生手段或职业看,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二者的区分在哪里呢?孙覿《宋故府君陈公景东墓志》云:“均之卜也,日阅数十人、得百钱足以自给,则闭肆下帘,不更筮也;均之医也,闻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于利。”^{[9](P.428)}也就是说,同样为“医卜”,超越名利、慈悲为怀、德行都更高一筹的“医卜”,才可以称得上是处士;那么,与之相反,那些汲汲于名利的“医卜”,无论技艺多高,却只能被称作是游士。因此,城镇处士是指德行很高的民间文化人。

宋人对处士、游士的区分大体都遵循这个道德原则。如苏轼《种德亭并叙》云:“处士王复,家于钱塘,为人多技能,而医尤精,期于活人而已,不志于利。筑室候潮门外,治园圃,作亭榭,以与贤士大夫游,惟恐不及,然终无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艺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种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作诗以遗之。”^⑤王复就是符合士大夫所倡导之道德规范的、典型的城镇医卜类处士。

黄庭坚、陈师道等人曾为一位陈留市内的刀镊工写诗唱和,称其为“市隐”^⑥,认为这位手艺人是一位悟道的高人处士。王安石《处士征君墓表》:“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于真州之扬子。杜君者寓于医,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时时穷空,几不能以自存,而未尝有不足之色。盖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旷然无累于物,而予尝与之语,久之而不厌也。徐君忠信笃实,遇人至谨,虽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见,寓于筮,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23](P.15)}杜君、徐君这两位擅长医卜的人,正是高于一般市井小民以及游士的处士。

处士与游士,从处、游二字本义上看,原本只

是居处、游走两种生活形态的差别。但在宋人看来,区分城镇处士和游士的标准,不是游处形态,不是职业贵贱,也不全是技艺高低,而是德行。德行具高的处士受人尊敬,而游士则常常被视为游谈无根的江湖骗子,受到人们鄙视。如果从道德层面考察,处士文化不仅高于普通民众文化,而且高于游士文化。

然而,德行作为道德层面的标准,颇为抽象,特别是在具体判断某个人时,常常会出现混淆的现象。譬如,有不少处士乃至进士,都曾有过或长或短时间到处游走求学或干谒的经历,这种经历常使得其前后阶段身份界限模糊,如彭汝砺《题程则之瑞墨阁》序云:“三灵山人则之,少游王公大贵人之门,得仁宗皇帝御书数轴,构阁而藏之,名以瑞墨,而乞诗于予。”^{[24](P.242)}这位程则之年轻时的行为完全属于游士,而彭汝砺所赠诗句中却云“凤鸾影落新安水,奎壁光临处士庐”,将其称作处士。这是因为程后来选择了居处?还是因为处士是比游士从名号上看更适宜礼貌称颂?

由此看出,游士和处士理论上很好区分,但实际上却难以截然分开。特别是不少人基于礼仪文明,总是在诗文中客气地将游士称作处士时,处士就成了虚美谬赞的名号,成了包涵许多游士在内的庞杂名称。因此,如果不细化的话,处士就是包括了游士在内的民间文化人的代称,是基层、低层甚至底层的士人,是农工商中所有有文化技艺的创造出了民间文化、在野文化的人。

五、被隐藏或遮蔽的处士文化乡土市井底色

处士既然是农工商中的文化人或文化技艺人,自然比士大夫更贴近乡野市井,其文化也要比士大夫文化更具有乡土市井底色。

处士文学是处士们反映自身生活及文化的作品,理应也具备更多乡土市井气息,但是从处士们现存的诗歌及其他文学创作中,却很少感受到这种气息。处士诗文词很少粗野粗糙、粗俗拙劣、油腔滑调,很少违背士大夫审美情趣,即便是身为富民、“医卜”,其诗文词表现出与士大夫相差无几的审美追求。这导致现存的大多数诗文词,仅从审美趣味理念上考察,如果没有特别的身份提示,几乎分不清作者是官员还是非官员。

处士文学常被视作隐逸文学,是因为处士们一直在表现隐逸这个主题。为什么他们要反复不断表现这个主题?主要是由于士大夫在官场生活烦闷或腻味后,常常表示向往隐逸闲适的生活,使

得处士们发现不仕即隐逸是他们唯一可以向士大夫夸耀或自傲的资本。

几乎所有处士都是科场以及仕途的失败者,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士大夫没有什么不同,即便失败,教育的痕迹仍然留存,他们向往士大夫优雅的生活,将士大夫的审美追求作为自己的追求。不少处士都在努力消除自身的乡土市井色彩,以便向士大夫所期待的风雅靠近。释文莹云:“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蔓,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蔓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讫事,戒其子,使毕之。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咒之曰:‘大人已曾上闻。’皇祐中,馆阁以为雅戏,凡或谈话清谈,则曰‘宜撒园蔓一巡’。”^{[25](P.30)}处士身为低层文化人,却试图保持儒生非礼勿言的准则以显得文雅,以至于举止言行显得不合时宜而矫情迂腐,受到馆阁士人们的雅谑,连僧人都觉得其“事矫怪”。这个事例可以表明处士们在言语行为上,做出了多少摆脱乡土市井气息的矫枉过正的努力。

尽管医卜类技能比诗歌更能为他人服务,更能满足社会生活需求,但是对于许多医卜技能类处士而言,诗歌的价值地位却远远高于自身掌握的医卜技能。郑刚中《相说》中谈到的毛相士就是如此:“相士毛生之来,未露见所挟,而先出其集诗,又要余同赋,语意勤切三四至。余怜而问之曰‘处士之艺何如耶?’对曰‘吾之艺,视人贵贱寿夭,如开眼见黑白,探隐匿而中其微’。余曰:‘得所挟矣,何患无知者?携一败篋,自可弛担得名声,不但苏妻子也。诗何所裨耶?诗文亦不当相付,无乃使人疑子之术,谓其挟彼不挟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衢,以儒为业,箕裘隳败至此,故所在非特喜为士大夫谈说,而士大夫亦喜为吾赋诗,此篋中之所为富也。’余曰:‘若谓种习自笔砚中来,则请子收拾诗编,谨藏之第,余终不敢以诗所挟。’”^{[17](P.79)}作为儒者的后代,毛氏认为他自己相术虽然精湛,但不登大雅之堂,而诗歌才是高雅的艺术,因此他更愿意与士大夫谈谈艺术,会到处请士大夫为之写诗而增强其自信与声名,且常在展示其相术之前会先以士大夫的诗歌为之取信增价。

很多处士都像毛氏一样急于向士大夫主流文化致敬,而忘却了本身之所长。这是对自身文化不自信的结果,因而妨碍了处士文化本身本业的发展。

处士的文学创作,本应传达出处士的生活真实状态以及自身的审美情趣,却因为其自身身份意识的不够坚强独立,常常自我掩饰其不能被士大夫阶层接受的一面,导致其文学附庸风雅性强而自立性弱。这一切,显示出处士文学乃至文化对士大夫文学文化的依附性或趋附性。处士文学因而没有形成特别鲜明的、足以冲击士大夫文学的审美形态。

王安石《处士征君墓表》谈到三位处士,其中“杜君讳婴字大和,徐君讳仲坚字某”二人,“以医筮,故多为贤士大夫所知”,而另一位征君“能为诗”,却“独不闻于世”。^{[23](P.15)}显然,“医筮”对士大夫而言,更加实用,而诗歌对于士大夫而言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值得称扬。多数士大夫就像郑刚中一样,认为相士毛氏夸耀诗文而不夸耀自身技艺,是买椟还珠式的分不清轻重缓急。士大夫这种观念无疑阻碍了处士们的文学创作及其对文学创作的热情。

士大夫对处士并非像诗文中所写的那样全然尊敬,尤其是对工商类处士。工商类处士对生活在城镇的士大夫而言,有更多的实际用处,他们经常以技艺服务于士大夫,士大夫对他们也常有诗文褒扬,但从士大夫内心上讲,却不如对乡野处士那么尊重,这可能是由于乡野处士经济富足独立,而城镇处士却需要从士大夫以及其他阶层处获得生活资本。医卜手工等文化类技艺处士,创造了最有民间特色的市井处士文化,却因为既被士大夫使用又被其鄙视,而未能得到更大的张扬发展。

无论士大夫还是处士,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隐藏或遮蔽处士的世俗生活情状,而试图将处士实际生活美化、诗化或抽象化为一种纯粹精神性符号即“隐逸”。这个隐逸符号,不仅掩饰了山林乡村处士的乡土粗豪之气,也掩盖了医卜类处士的市井粗俗色彩。而这一切,可以说既是处士们刻意表现的结果,更是士大夫们的期待与理想。

士大夫在与处士交流时,常以士大夫阶层自身审美标准,有意无意省略或忽略处士们的乡土市井底色,专门取其符合士大夫审美理想之言行修为描述褒扬。士大夫与处士二者共同努力,将高雅脱俗塑造成处士最具号召力的标志,成为公

认的常识化的处士文化基本特色,使得隐逸文学文化因而取代了处士文化,遮蔽了处士文化中应有的底色。而对处士文化的探索,就是要透过隐逸文学与文化而还原其本色。

注释:

①《礼记·玉藻》:“居士锦带”,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魏野是处士,自号“草堂居士”。(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十三经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80页。

②明清时常用的“乡绅”一词指地方上有权势财富且有些文化的人,但宋元以前很少用这个词汇。当时的乡绅或地方精英,一般被称作处士,也常被称为“名胜”,如《诗人玉屑》卷十九云“陈觉民宰建阳,尝喜靖安山水,暇日与名胜登览赋诗。”处士与各地的山川古迹“名胜”一样,被视作地域历史文化的标志。

③《赠欧阳可夫序》、《赠罗一新序》二文在刘煊《云庄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412、413页)以及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39、440页)均出现,未能断定其归属。

④参见拙作《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崛起》,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⑤(宋)苏轼撰,(清)王文皓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23页。苏辙《赠王复处士》:“候潮门外王居士,平昔交游遍海涯。本种杉松为老计,晚将亭榭付邻家。为生有道终安隐,好事来游空叹嗟。犹有东坡旧诗卷,忻然对客展龙蛇。”(注云:王君旧有园亭,子瞻兄名之曰种德,其亭顷以贫故,鬻之矣。)(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69页。

⑥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卷六《陈留市隐并序》:“陈留市中有刀镊工,与小女居,得钱,父子饮于市,醉则负其子行歌,不通名姓。江端礼传其事,以为隐者。吾友陈无己为赋诗,庭坚亦拟作。”(宋)黄庭坚撰;(宋)任渊注;刘尚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0页。《后山诗注》卷七亦有。

参考文献:

- [1](宋)叶祖洽.先生行状[A]// (宋)陈襄.古灵集(卷25)[M].四库全书本.
- [2](宋)王禹偁.小畜集(卷26)[M].四部丛刊本.
- [3](宋)徐铉.徐骑省集(卷20)[M].四部丛刊本.
- [4](宋)潘阆.逍遥集[M].四库全书本.
- [5](宋)寇准.寇忠愍公诗集(卷中)[M].宋集珍本丛刊.
- [6](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7](清)厉鹗.宋诗纪事(卷4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8](宋)吕本中.东莱诗集(卷20)[M].四库全书本.
- [9](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39)[M].四库全书本.
- [10](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5)[M].四库全书本.
- [11](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2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2](宋)杨亿.武夷新集(卷2)[M].宋集珍本丛刊.
- [13](宋)王禹偁.小畜集(卷11)[M].四部丛刊本.
- [14](宋)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4)[M].宋集珍本丛刊.
- [15](宋)王禹偁.小畜集(卷22)[M].四部丛刊本.
- [16](宋)杨亿.武夷新集(卷6)[M].宋集珍本丛刊.
- [17](宋)郑刚中.北山集(卷5)[M].四库全书本.
- [18](宋)曾巩.元丰类稿(卷48)[M].四部丛刊本.
- [19](宋)赵蕃.淳熙稿(卷18)[M].四库全书本.
- [20](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9)[M].四库全书本.
- [21](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1)[M].宋集珍本丛刊.
- [22](清)厉鹗.宋诗纪事(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3](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90)[M].四部丛刊本.
- [24](宋)彭汝砺.鄞阳集(卷6)[M].四库全书本.
- [25](宋)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收稿日期 2014-09-25 责任编辑 申燕